

张金吾抄录书籍考

——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

李文洁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爱日精庐藏书志》对藏书来源的记录,概述张金吾从私人藏书家处抄录书籍的基本情况。着重以张金吾从黄丕烈处传录的书籍为考察对象,结合题跋资料及相关书籍的存世情况,逐一梳理其抄录情况以及抄录书籍的来源和去向,从而部分地还原了张金吾借抄黄丕烈书籍的情形。研究过程中发现,黄丕烈旧藏书籍在当时曾被多位藏书家传录,形成了具有同源关系的多部抄本,这为辨别清抄本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而通过二人传录书籍的实例,也可更好地了解当时藏书家以借抄来互通有无的现象。

关键词: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 黄丕烈 书籍来源 借抄

江南为人文荟萃之地,苏州、常熟一带尤有好古嗜书之风。《〔同治〕苏州府志》述及常熟藏书云:“常邑自绛云、汲古,以至爱日、稽瑞,二百馀年间,储藏家代不乏人。”^①据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的藏书家数量,以苏州、常熟二地名列前茅,其中明清两代常熟的藏书家有将近300人^②。善本珍籍经由众多藏家互为假借、代相传递,构成独特的地域性的藏书文化。

清代常熟藏书家张金吾笃志储藏,多方购访、抄录,成吴中藏书之一家。下文将逐一梳理张金吾从藏书大家黄丕烈处抄录的古籍,尝试查考有关当时抄录具体情形、书籍来源及去向的蛛丝马迹,以期通过个案的研究更多地了解藏书家之间互相借抄这一现象。

①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卷一〇二,清光绪九年刻本,第4叶。

②曹培根:《论虞山派藏书家》,《图书馆》2005年第2期,第45-49、53页。

一、《爱日精庐藏书志》关于张金吾从私人藏书家处抄录书籍的记录

张金吾(1787-1829),字慎旃,别字月霄,昭文(今属江苏常熟)人。嘉庆十三年(1808)补博士弟子员,此后场屋不利,遂究心经术、讲求古籍。纂集经说八十余种成《诂经堂续经解》,采辑金、元篇章成《金文最》,又著《尚书义释》《两汉五经博士考》《十七史引经考》等。张金吾之生平以其自撰年谱《言旧录》,及其授业师黄廷鉴《张月霄传》所述最详。

张金吾“慕乡先辈汲古毛氏、述古钱氏遗风,笃志储藏”^①,在家中旧藏基础上积累至八万馀卷。后拣择其中善本,编为《爱日精庐藏书志》(简称“《藏书志》”),其自序述择书标准云:“择传本较稀及宋、元、明初旧刊暨传抄文澜阁本另为一编,凡万二千卷,非有裨学问、藉资考镜者不与焉。若有明及时贤著述,时代既近,搜罗较易,故亦从略。其前此逸在名山、未登柱史,为世所不经见者,则间附数言,以识流别,名之曰《爱日精庐藏书志》。”^②最初纂集之《藏书志》四卷,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活字排印,次年印成。后以图书增益颇多,重编为三十六卷,于道光三年(1823)开始刊刻,三年后又将新得之书编为《续志》四卷一并付刊,道光七年刊成^③。

张金吾《藏书志》吸收前人书录解题的方法,著录书籍基本信息并简要考证内容、版本,辑存原书序跋,并记录藏书源流,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关于书籍来源,此前多见题跋对珍本辗转流传之叙述,却少有藏书目录对收藏来源作普遍说明。张金吾《藏书志》在这一方面的记录,为后人了解古籍的收藏、流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藏书志》对书籍来源的记录主要为两种情况:一是标注书籍曾为某名家旧藏^④,如卷二十《金石录》为“汲古阁藏书”;二是说明书籍从何处抄录,如卷一《周易象义》为“文澜阁传抄本”、卷三十一《后村先生大全集》为“从天一阁旧抄本影写”。张金吾所以标注传抄本的来源,盖因所抄书籍本身珍稀难得,而张金吾亲自操持或委托他人传抄时知其来历,那么记录书籍的来源其实也是对其所据版本的可靠说明。

①黄廷鉴:《第六弦溪文抄》卷四《张月霄传》,清道光二十年刻本,第17叶。

②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清嘉庆二十五年张氏爱日精庐活字印本,张金吾自序。

③关于《爱日精庐藏书志》的历次刊刻,参见《言旧录》嘉庆二十四年及道光三年、六年、七年记述(张金吾:《言旧录》,吴兴刘氏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

④据王珠美统计,《爱日精庐藏书志》中记录汲古阁旧藏40种、钱曾述古堂旧藏11种、季振宜旧藏15种等(王珠美:《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研究》,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第80-91页)。

张金吾访书以购买、抄录为主,所谓“闻有古刻旧抄,不惜多金购访,或缮抄秘阁,或假录相知”^①。《藏书志》著录古籍约 800 部,标明为传抄者计 143 部,抄本中除 7 部为张金吾父手抄,其余皆为金吾传抄。在其中部分书籍为家中旧藏的前提下,传抄本的比重相当可观,可以说抄录是张金吾留存稀见文献的重要方式。根据《藏书志》对书籍来源的记录,张金吾从文澜阁抄录者计 91 部、从《道藏》抄录者 2 部,而从私人藏书家处抄录者计 50 部,分别对应“缮抄秘阁”与“假录相知”。《藏书志》所记张金吾从私人藏书家处整部抄录的书籍,约占传抄本总量的 36.8%。兹将《藏书志》中所记相关信息列表 1 如下:

表 1

序号	《藏书志》卷次	题名卷数	《藏书志》所记来源
从陈揆藏本传录 16 部 ^②			
1	卷十一	《宋太宗实录》残本八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
2	卷十五	《历代宫殿名》一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
3	卷十六	《嘉定镇江志》二十二卷	从陈君子准藏本传录
4	卷十六	《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	从陈君子准藏本传录
5	卷十六	《昆山郡志》六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
6	卷十六	《苏州府志》五十卷《图》一卷	从陈君子准藏明洪武刊本传录
7	卷十七	《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一卷	从陈君子准藏明嘉靖刊本传录
8	卷十七	《莆阳比事》七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
9	卷十八	《作邑自箴》十卷	从陈君子准藏本传录
10	卷十九	《律文》十二卷《音义》一卷	从陈君子准藏影宋本传录
11	卷二十	《绛贴释文》四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
12	卷二十三	《谯子五行志》五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
13	卷三十六	《萧闲老人明秀集注》三卷	从陈君子准藏金刊本影写
14	续卷一	《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八卷	从陈君子准藏元刊本传录
15	续卷三	《汉武帝内传》一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足本影写

①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黄廷鉴序。

②王珠美统计为 17 部,误计入《爱日精庐藏书志》卷十七著录的《北户录》,此书实为“文澜阁传抄本”,张金吾借陈揆藏本校对(王珠美:《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研究》,第 125-126 页)。

(续表)

序号	《藏书志》卷次	题名卷数	《藏书志》所记来源
16	续卷四	《唐李长吉歌诗》四卷《外卷》一卷	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
从黄丕烈藏本传录 12 部 ^①			
1	卷四	《仪礼疏》五十卷	从吴门黄氏藏宋刊本影写
2	卷七	《班马字类》五卷附《补遗》	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传录
3	卷十三	《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一卷	从吴门黄氏藏元刊本影写
4	卷十八	《麟台故事》三卷	从吴门黄氏藏本传录
5	卷二十二	《医学启源》三卷	从吴门黄氏藏本传录
6	卷二十三	《铜壶漏箭制度》一卷	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影写
7	卷二十三	《准斋心制几漏图式》一卷	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影写
8	卷二十九	《碧云集》三卷	从吴门黄氏藏宋刊本影写
9	卷二十九	《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	从吴门黄氏藏宋刊本影写
10	卷三十一	《北山小集》四十卷	原书未标注,实为从黄丕烈传录本再次传录
11	卷三十四	《铁崖漫稿》五卷	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传录
12	卷三十四	《铁崖先生诗集》十卷	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传录
从张丰玉藏本传录 9 部 ^②			
1	卷二	《尚书金氏注残本》六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传录
2	卷二十三	《新编四家注解经进珞琱子消息赋》六卷	从子谦侄藏宋刊本传录
3	卷二十七	《丞相魏公谭训》十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传录
4	卷二十九	《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鈞几文集》十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传录

①王珠美统计为 11 部,遗漏《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一著录的《北山小集》(王珠美:《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研究》,第 126-127 页)。

②张丰玉(生卒年不详),原名承涣,字子谦,号小庾,晚号拙庵,其曾祖仁美为张金吾祖父仁济之兄。廪贡生,援例授海州、直隶州训导,历署万年、乐平、浮梁县事。据张金吾《言旧录》“道光六年”记载,金吾以承涣为族中“动循规矩者”,然是年承涣责债,将爱日精庐藏书十万四千卷捆载以去,金吾愤然慨叹:“肱篋豪夺,且出于同宗子姓者。”(张金吾:《言旧录》,吴兴刘氏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

(续表)

序号	《藏书志》卷次	题名卷数	《藏书志》所记来源
5	卷三十一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传录
6	卷三十一	《水心先生别集》十六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影写
7	卷三十二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影写
8	卷三十四	《蛻庵诗》五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影写
9	卷三十六	《莲堂诗话》二卷	从子谦侄藏旧抄本传录
从何元锡藏本传录 6 部			
1	卷四	《礼记疑义》七十二卷	原书未标注,张金吾解题云: “从钱塘何氏藏本传录”
2	卷十三	《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	从钱塘何氏藏蒙古刊本传录
3	卷十五	《舆地纪胜》二百卷	从钱塘何氏藏宋刊本影写
4	卷十九	《大唐郊祀录》十卷	从钱塘何氏藏本传录
5	卷三十二	《桐江集》八卷	从钱塘何氏藏本传录
6	卷三十六	《阳春集》一卷	从钱塘何氏藏本传录
从张海鹏藏本传录 3 部			
1	卷二十九	《谗书》五卷	从照旷阁藏本传录
2	卷三十六	《樵歌》三卷	从照旷阁藏本传录
3	卷二十七	《续世说》十二卷	从照旷阁藏本传录
从天一阁藏本传录 2 部 ^①			
1	卷二十六	《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九十六卷	从天一阁旧抄本影写
2	卷三十一	《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从天一阁旧抄本影写
从言耐偲藏本传录 1 部			
1	卷十六	《重修琴川志》十五卷	从外舅言耐偲先生藏元刊本影写

①《尧圃藏书题识》卷八“《后村先生诗集大全》十一卷”条黄丕烈跋云:“近日常熟张月霄《爱日精庐藏书志》有《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抄本,从天一阁旧抄本影写,是世间稀有之本,系钱塘何梦华为阮宫保访求遗书,备《四库》所用,故搜罗及此,而为月霄录其副也。”(黄丕烈:《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93年,第195页)因张金吾《言旧录》中未见张氏赴天一阁之记录,从天一阁传录之二书或均由何元锡访书时为张金吾抄录。

(续表)

序号	《藏书志》卷次	题名卷数	《藏书志》所记来源
从张定球藏本转录 1 部			
1	卷三十四	《永嘉集》十二卷	从韵溪兄藏旧抄本转录

古之藏书家多视珍籍如秘宝,未肯轻易示人,能假借以传抄者更是难得。张金吾能够借书抄阅的也均为往来密切之友人。这其中,既有积书万卷的藏书家,如与金吾同里并称为“藏书二友”的陈揆、享有盛名的藏书大家黄丕烈、精目录版本好抄书藏书的何元锡;也有富于藏书的姻亲同宗,如曾刻印《墨海金壶》《学津讨原》的叔父张海鹏,又如子侄张丰玉、外舅言耐庵、同宗张定球。

除整部抄写的书籍,张金吾还曾多次从私人藏书家处借书,对自己的藏书进行抄补或校对。比如,张金吾曾根据陈揆藏旧抄本,补抄己藏的述古堂抄本《何博士备论》(《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一著录,以下简称为“《志》卷几”);曾用陈揆藏本校抄本《淳祐玉峰志》(《志》卷十六)、校文澜阁传抄本《北户录》(《志》卷十七),用陈揆从黄丕烈传录本校明刻本《齐民要术》(《志》续卷三)。曾以黄丕烈藏本抄补明刻本《圣济经》的卷七至十(《志》卷二十二)。曾以张丰玉藏明天顺刻本校旧抄本《贡礼部玩斋集》(《志》卷三十四)。

张金吾收藏中还有一些书籍,其借、抄过程更为间接或复杂。比如张金吾购得明刻本《齐民要术》(《志》续卷三)后,又借陈揆临写本,请黄廷鉴再以照旷阁刻本三本合校,而所借陈揆本则临写自黄丕烈藏本。事见黄廷鉴跋:“今春月霄于鹿城书肆得明人单刻本……同里陈君子准曾手临吴门士礼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霄假以畀余,遂合照旷阁新刊本诸条细勘。”《汉武帝内传》(《志》续卷三),乃从陈揆藏本影写。但最初是黄廷鉴倩人影抄陈揆藏本,之后转归张金吾。黄廷鉴跋云:“今春从陈子准处借得旧抄足本读之,知俗本皆删节过半,即毛刻亦多脱落,益见旧本之足贵矣。爰倩表弟陈竹亭影写一帙藏之。”《文房四谱》(《志》卷二十四),金吾解题谓为“琴六夫子从何君梦华假鹤梦山房、振绮堂两抄本校补”。是书最初为黄廷鉴从照旷阁藏本转录,经黄廷鉴借何元锡两本校补后,又转归张金吾。黄廷鉴跋云:“此书向无善本,照旷阁刊《学津》时,出其家藏抄本属校,谬误殆不可读……缘是录副未梓。己卯(1891)冬晤钱塘梦华何君,云近得鹤梦山房旧抄完本,从之借校。今春梦华携书来,知又新从振绮堂汪氏本校过者,狂喜欲绝。鉴遂从两本合校一过。”^①

^①张金吾撰,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中华书局,2012年,第659、668、325页。

张金吾访书精勤,陈揆称其“闻吴兴旧家有未见图籍,欣然往观”^①,对于流传稀少的珍籍则抄录副本以留存文献。张金吾能够抄录秘籍,缘于他依托亲朋、师友建立的书友圈。张金吾所与交游的藏书家虽不称广,却稳定可靠。除了从关系密切的藏书家处直接借阅,不少书籍是以书友为介,辗转观书、借书、抄书,或抄录整部从而增加藏书种类,或抄补、抄校以完善已收藏书籍的内容。张金吾与他的书友藉助抄录建立了或直接、或间接的书籍交流。

二、张金吾从黄丕烈处抄录书籍之可考者

张金吾所从抄录的私人藏书家中,黄丕烈是藏书最富、最精的一位;而黄丕烈藏书之书目、题跋资料,远较他人丰富。这里,笔者以张金吾从黄丕烈所抄录的12部书籍为研究对象,根据相关资料及相关书籍的存世状况,尝试考察这些书籍的抄录情形。

黄丕烈长张金吾二十余年,藏书早有盛名。张金吾得以与黄丕烈交游,亦是以书为缘。嘉庆二十三年(1818),张金吾曾从黄丕烈借明刻本《熊勿轩先生文集》校勘,跋云:“嘉庆戊寅假黄尧圃丈家藏成化刊本校勘一过。”^②嘉庆二十四年,黄丕烈跋《洛阳伽蓝记》云:“中秋后五日,钱唐何君梦华邀余陪琴川陈、张二君。陈字子准、张字月霄,皆近日好购古书之友。”^③此处黄氏书张金吾姓字,或因是与张金吾交往的较早记录。此后直至道光五年八月黄丕烈故去前六七年间,二人的书籍之交尚多。道光元年(1821),黄丕烈曾借阅、录副张金吾藏宋刻本《续颜氏家训》,并校己藏另一宋刻本,黄跋云:“余因修郡志事,访友琴川,过精庐,从主人月宵二兄借归,手为翻阅,并录其副。”^④道光二年(1822),黄丕烈为张金吾录副《北山小集》,并跋云:“(月霄)闻余有此,欲传其副,遂复从余分写本仍分写予之,并讐校之。”^⑤同年,黄丕烈从张金吾处录副《刑统赋解》,跋云:“顷得元人沈仲纬《刑统赋疏》,复从张

①陈揆:《稽瑞楼文草》不分卷《题张氏新编金文》,清光绪十年翁同龢刻本,第3叶。

②熊禾:《熊勿轩先生文集》,国家图书馆藏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索书号:善本07094),书末过录张金吾跋。

③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三,第52页。

④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五,第107页。

⑤程俱:《北山小集》,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七年张蓉镜家抄本(索书号:善本11401),书末过录黄丕烈跋。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八误“余分写本”作“余之写本”(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八,第185页)。

月霄借归,录此副本。”^①道光四年(1824),黄丕烈跋影宋本《博雅》云:“今归爱日精庐。郡邑迁流,不知其极,苟得其人,何分郡邑耶?”^②以上几则题跋,记录了黄丕烈与张金吾相互借抄,或转归书籍之事,可以见出二人有着较多的书籍往还。

《藏书志》记录从黄丕烈传抄的12部书籍中,有4部留存至今,有迹可循;有1种目前仅知刻本传世,可暂时搁置不做讨论。这里先分别说明此5部书籍的相关情况。

(一)《碧云集》三卷(《志》卷二十九)、《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志》卷二十九),均从吴门黄氏藏宋刊本影写。

道光三年,黄丕烈于昆山古董铺收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碧云集》(简称:“《碧云》”)和《李群玉诗集》(简称“《群玉》”)。《碧云》《群玉》二书宋本经文征明、安岐、季振宜、徐乾学、邓邦述收藏,今藏台湾傅斯年图书馆(二书索书号:844.1 161)。

黄丕烈获二书宋本后曾进行影写。道光四年,黄丕烈跋影宋抄本《李群玉诗集》云:“宋刊《碧云》《群玉》两集,予于去春送考玉峰时得者也……海虞友人张君欲丐予让之。予因是役也,为三孙美镛入学招覆始得寓目。前此正考时,往观无所见,今再来重观方遇之。携归日,即命三儿寿凤镌小印曰‘碧云群玉之居’,钐于长笺短札,自谓得少佳趣。故未之允。既而允为之录副,月霄欣然从予请,不惜重赏酬抄骨。”^③则所谓从吴门黄氏藏宋刊本影写之《碧云》《群玉》,乃张金吾不惜重金请黄丕烈雇胥录副,宋刻原本并未借出,在黄丕烈士礼居即完成抄录。也正因此,国家图书馆将此二影写本著录为“道光四年黄氏士礼居影宋抄本”(索书号:善本 06645、善本 06646)。二影写本均有黄丕烈跋,其中《碧云集》黄跋提及张金吾云:“予举此以与月霄赏析之。异地同心之友,眼下寥寥,可慕抑可慨也。”^④既有黄跋,内容又与张金吾相关,足以说明此二书就是黄丕烈为张金吾录副之本;且二书除题跋末的钐印,黄丕烈仅钐“尧圃过眼”,应是黄氏用以表明二书并非己藏。但是,书中却无张金吾本人之钐印。

在调查《碧云》《群玉》的存藏情况时,笔者发现除了上述张金吾藏本,台湾汉学中心还藏有清琴川张氏小琅嬛福地影宋抄本。二本钐有“虞山张蓉镜芙川信印”“小琅嬛福地缮抄珍藏”等印,当为张蓉镜所抄。其中,《碧云

①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二,《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六),第301页。

②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一,第21页。

③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三,第316页。

④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七,第169-170页。

集》(索书号:402.43 09920)卷末过录黄丕烈题跋一则,《李群玉集》(索书号:402.42 09876)过录黄丕烈跋两则。二书过录之黄跋与国图所藏黄丕烈为张金吾副本相较,不仅文字相同,且字迹摹写逼真,只是跋末无黄丕烈铃印。可以推断,张蓉镜抄本与题有黄跋的张金吾影抄本有直接关系。

(二)《铁崖漫稿》五卷(《志》卷三十四)、《铁崖先生诗集》十卷(《志》卷三十四),均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传录。

黄丕烈曾藏《铁崖漫稿》五卷、《铁崖先生诗集》十卷,皆为旧抄本。黄丕烈于嘉庆五年(1800)跋《铁崖先生诗集》云:“余向藏《铁崖漫稿》为旧抄本,皆文也。别有一册诗亦抄本,较《漫稿》笔致稍时近。有人携此《诗集》三册来,云是骑龙巷顾氏物。检其旧传书帐,果有之,盖顾氏书散已久,此其仅存者尔。索直十金,以每册二两易得。取其抄手甚旧,疑出自洪永间,可与《漫稿》为合璧。”^①黄丕烈所藏旧抄本,今未见流传。

张金吾从黄丕烈传录之二书,今皆藏南京图书馆(《铁崖漫稿》索书号:GJ/EB/111621、《铁崖先生诗集》索书号:GJ/113568),均铃“秘册”“爱日精庐藏书”二印,为张金吾抄藏无疑。其中的《铁崖先生诗集》卷八至十用另一清抄本配补,书末亦过录黄丕烈跋。

《铁崖漫稿》《铁崖先生诗集》除张金吾抄本外,南京图书馆还分别藏二书清抄本各一部。其中清抄本《铁崖先生诗集》(索书号:GJ/EB/111624)书末过录黄丕烈跋,应源于黄氏旧藏,铃“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并有丁丙跋,为丁氏家藏^②,但抄写时间还需考察。此外,南京图书馆还藏有《铁崖杨先生诗集》二卷一册(索书号:GJ/EB/111618),亦为张金吾爱日精庐抄本,铃有张氏藏印“秘册”“爱日精庐藏书”。黄丕烈跋《铁崖先生诗集》时提到:“别有一册诗亦抄本,较《漫稿》笔致稍时近。”因杨维桢诗集并无太多版本流传,疑此《铁崖杨先生诗集》或即抄自黄跋提到的《诗》一册。然《藏书志》未著录此本,丁丙以为:“《藏书志》中未列此书,当是书成后所得耳。”^③此说有待商榷。一是黄丕烈旧藏的铁崖先生诗文三书相关度极高,张金吾搜集金文,若从黄丕烈处抄录,很有可能一并抄录。二是张金吾刊刻《藏书志》三十六卷,自道光三年开始,道光六年并刊《续编》四卷,至道光七年刊成;而在《续

①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九,第217页。

②道光二十三年(1843),丁丙父丁英迁居杭州皮市巷,名其堂曰“正修堂”,后再迁居时仍沿用旧时堂名(参见周膺、吴晶:《丁丙及杭州丁氏家族家世考述》,《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第80-91页)。

③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四,《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第625页。

编》付刊的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其藏书尽为其侄张丰玉取去,此段时间张金吾购书的可能性很小,此后更无力购书。以此推之,张金吾未将《诗集》二卷收入《藏书志》,恐并非因得书太晚,或是因《诗集》二卷内容不及十卷本丰富,且又“笔致稍时近”,未达到张金吾择书的标准。

(三)《医学启源》三卷(《志》卷二十二),从吴门黄氏藏本传录。

张金吾搜求金代文献,从黄丕烈处抄得是书。《藏书志》解题述抄录事云:“是书自《敏求记》外,无著录者。金吾编辑《金文》,因是书有兰泉张建一序,购访十馀年不获。甲申(道光四年)春,读士礼居书目见有是书,亟假归录副,为狂喜者累日。”^①张金吾《金文最》于道光二年编成,《医学启源》为成书后收得,张建序未能收入。而《医学启源》一书仅知明刻本存世,未见抄本流传。

从黄丕烈处传录的抄本,自然纳入张金吾藏书,并大多记录在《藏书志》中。但这些抄本并不一定钤有张金吾之藏书印鉴,即如上述之《碧云集》《李群玉集》。如果将调查范围扩大至爱日精庐抄本,古籍书目及各图书馆所著录的张氏爱日精庐抄本数目寥寥,其原因恐怕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版本依据。除上述四部之外,目前查知著录为张金吾抄本或爱日精庐抄本者,国家图书馆5种、南京图书馆又5种、台湾汉学中心又1种,其中包括从文澜阁传录者。再将范围扩大到张金吾藏书,我们发现即使流传有序,有较大把握追溯其书曾经张金吾收藏,但其中很多书籍也没有张氏藏印。如果张金吾并未使用藏书印来标记自己的全部藏书,又缺少关于文献传藏的其他资料,张金吾传录本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很可能湮没于众多“清抄本”之中,难以辨别。

三、张金吾从黄丕烈处抄录书籍之不可考者

张金吾从黄丕烈处抄录的另外的7种书籍,因版本依据不足,很难断定存世抄本何种为张金吾抄本。但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而未为人普遍关注的现象:这几部书并非仅为张金吾抄录,约略同时亦有他人曾经录副。

(一)《仪礼疏》五十卷(《志》卷四),从吴门黄氏藏宋刊本影写。

黄丕烈藏有宋刻单疏本《仪礼疏》,中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百宋一廬书录》收录,谓得于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②。嘉庆五年,顾广圻曾用行世各本校勘,称其为“实于宋槧书籍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莫与比伦者

^①张金吾撰,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二,第296页。

^②黄丕烈:《百宋一廬书录》,《清人书目题跋丛书》(六),第411页。

也”^①。道光十年(1830)汪士钟艺芸书舍曾影刻宋本,然宋刻原本未见传世。今存各本,亦无张金吾抄本的明显证据。

黄丕烈曾为是书“影宋单疏本”所作跋,谓“余近得《仪礼疏》七帙”,则此影抄本于得宋刻后不久即抄写;以张金吾年齿及与黄丕烈交游时间,张金吾传录是书不可能在嘉庆早期,应非此本。士礼居影宋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善本 02407),卷首有黄丕烈书《校宋刊单行本仪礼疏凡例》,署“士礼居主人识”,末钤“黄印丕烈”“复翁”;书中有“脱简”“阙文”等印记,曾经黄氏校勘;书末有黄丕烈跋、顾广圻跋;首册护叶钤“学耕堂印”。国图另有一抄本(索书号:善本 06329),仅存三十一卷前的七卷,字划稍疏朗,但行款、版式与士礼居影宋抄本全同,亦可称影抄;该抄本钤“稽瑞楼”,曾为陈揆收藏。如果做一大胆的推测,陈揆藏本会不会是直接或间接地从黄丕烈藏本抄录的呢?若是如此,《仪礼疏》除黄丕烈本人曾经抄校,至少又有张金吾、陈揆二人曾作传录。

(二)《班马字类》五卷附《补遗》(《志》卷七),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传录。

《爱日精庐藏书志》解题谓是书:“惜传本绝稀,藏书家几无有知其名者,故亟著于录云。”^②黄丕烈藏旧抄本、张金吾传抄本皆不明确是否传世。

国家图书馆藏另一清抄本(索书号:善本 06319),却是从黄丕烈藏本传抄而来。此清抄本钤“稽瑞楼”,为陈揆藏书。书末粘贴未署年信札一纸云:“委抄《班马字类补遗》,都业已竣事。兹特送□之,祈照入计抄资及代买纸装订,共需番饼六枚。此更希即摊付以便转给也……愚侄黄美镠顿首。子准老丈先生侍安。”信中称是书为《班马字类补遗》,并非仅为李曾伯《补遗》,而是在《班马字类》各韵之后附有《补遗》。根据信札内容与书中钤印,此抄本乃陈揆委托抄录,经手者则为黄丕烈长孙黄美镠,传录所据即黄丕烈藏本。则此《班马字类》至少有张金吾、陈揆二人从黄丕烈处抄录。

(三)《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一卷(《志》卷十三),从吴门黄氏藏元刊本影写。

乾隆六十年(1795)^③,黄丕烈从书肆偶获元刊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诧为希有,遂请钱大昕审定,大昕据之驳正《元史》数条,并为之作跋。黄丕烈跋元刻本云:“余既重其书之有补于《元史》,且重先生之跋足以表章

①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一,《清人书目题跋丛书》(六),第608页。

②张金吾撰,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第102页。

③黄丕烈跋是书抄本谓“嘉庆二年春正月”得书,此处据元刻本黄丕烈、钱大昕二跋题署时间。

是书也,急为重付装池,再加表托,其费几至数十倍于书价而不惜。”^①

是书元刻本未见流传,但有三部影元抄本传世。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善本 03659),有佚名过录元刻本中钱大昕、黄丕烈所书题跋;卷首钤“稽瑞楼”,曾为陈揆藏书,后为铁琴铜剑楼收得,瞿氏书目著录此从“郡中黄氏所得元刊本传录”^②。二为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线善 27856),有佚名过录钱大昕跋,递藏信息不详。三为南京图书馆藏本(索书号:GJ/KB1693),有佚名录清钱大昕跋,另有丁丙跋,书中钤“虞山张蓉镜芙川信印”“蓉镜”等,曾为张蓉镜收藏。此外,《尧圃藏书题识》另载黄丕烈为是书抄本所作跋,“余因装治(元刻本)成帙,播诸友人,而是录遂有闻于世矣”^③云云,此跋未见于现存诸抄本之著录。以上3部《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抄本,皆有可能来源于黄丕烈,并黄氏所跋抄本,此书至少曾抄写4部。

(四)《麟台故事》三卷(《志》卷十八),从吴门黄氏藏本传录。

黄丕烈藏本乃从一旧抄本影写而来。嘉庆十九年(1814),黄丕烈从陈增处借得《麟台故事》影宋旧抄本,并抄录一部。其事见黄丕烈题旧抄本跋:“初书贾携来,手校一过,乃知其佳。旋因议价未谐,复携去。后知归于西畝草堂,遂倩余友胡韦洲转假影录一册,积想顿慰。还书之日,敬志数语以拜嘉惠。”^④黄丕烈抄录所据明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善本 07454),存卷一至三,书末有钱谷识、黄丕烈跋,钤“钱谷”及“仲遵”“西畝草堂”等印,确为迭经钱谷、陈增收藏之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五部清抄本中,今知有三部清抄本与黄丕烈抄录底本存卷相同,且过录底本原有之钱谷、黄丕烈题跋,应与底本有着渊源关系。但或因抄写者时代较晚,或不详何人何时所抄,不能明确与抄写底本的直接关联。而台湾汉学中心收藏的清琴川张氏小琅嬛福地影宋抄本(索书号:213.71 04901),亦与黄丕烈藏本有关。书中钤“琴川张氏小琅嬛清閤精抄秘帙”“小琅嬛福地缮抄珍藏”等印,明其为张氏小琅嬛福所抄。而卷末过录黄丕烈题于明抄本中之跋文,卷前过录张金吾跋谓:“(此本)后附郡

①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二,《清人书目题跋丛书》(六),第37页。

②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第156页。

③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二,《清人书目题跋丛书》(六),第37页。

④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三,《清人书目题跋丛书》(六),第59页。

城黄尧圃丕烈先生跋,余盖从之传录云。”^①则此本又当是张蓉镜从张金吾处再次传写,且将张金吾传录本中的黄丕烈、张金吾跋一并抄录。

(五)《铜壶漏箭制度》一卷(《志》卷二十三)、《准斋心制几漏图式》一卷(《志》卷二十三),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影写。

黄丕烈藏此二书旧抄本,黄氏本人即曾录副并于道光三年跋云:“此《铜壶漏箭制度》《准斋心制几漏图式》共二种,见诸《文渊阁书目》阴阳书‘字’字号,《准斋》字五十四、《铜壶》字五十五。此本叙次先后互易,从其古本之流传也。原书旧抄当是影宋,余恐流传未广,录副以便传观,或互相抄录,俾晦者益彰,岂不快与?”^②

黄丕烈原藏旧抄本未见流传。而黄丕烈录副且自藏之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铜壶》(索书号:善本 03482)、《准斋》(索书号:善本 03483)二书合抄一册,书末有上述黄跋,并钤“士礼居藏”“尧圃抄藏”等印。结合黄跋中“或互相抄录,俾晦者益彰”等语,二书还当为友人传抄,张金吾影写者即为其中一部。《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二书之“吴门黄氏旧抄,张金吾藏本”^③,字面意思是由黄丕烈抄录而由张金吾收藏,但从宽泛意义和实际情形上理解,也可能是张金吾有录副之请,黄丕烈为之“抄录”,也即张金吾“从吴门黄氏影写”。

(六)《北山小集》四十卷(《志》卷三十一),从黄丕烈传录本再传录。

黄丕烈于乾隆六十年以每册二金之重价购得宋本《北山小集》,并录之于《百宋一廛书录》,宋本后转入汪氏艺芸书舍。今台湾汉学中心藏宋本一部(索书号:402.53 10399),钤有黄丕烈跋中记录的“黄氏淮东书院图籍”,又有“汪印士钟”,是为黄丕烈旧藏宋本,然仅存卷二十四至二十七共四卷,在流传过程有所佚失。

道光元年,黄丕烈从艺芸书舍借归宋本抄录,次年复为张金吾从抄本传录。黄丕烈于跋中详述抄录原委云:“《北山小集》为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与吾郡典实有涉,故钱潜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入《养新录》中,谓他日

①程俱:《麟台故事》,台湾汉学中心藏清琴川张氏小琅嬛福地影宋抄本,卷前过录张金吾跋。

②孙逢古:《铜壶漏箭制度》《准斋心制几漏图式》,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三年黄氏士礼居抄本,书末黄丕烈跋。《尧圃藏书题识》误“晦者益彰”作“晦者益新”(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四,第82页)。

③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邵亭知见传本目录》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1页。

修志可资考证。噫！潜研往矣，而是集余不能守，早归艺芸书舍。当日家藏时，无暇传录副本，此又余生平缺憾事也。岁辛巳，郡中有修志之举，始忆及此，遂向主人借归，分手传录。录毕细校，即以原本归赵，而余亦作一小跋，记其原委，是又为此书添一公案矣。海虞月霄张君爱素好古，收弄秘册甚多，著有《爱日精庐读书志》，于一书之源流，纤悉毕具。余所归之书，亦得附名简末，此真读书者之藏书也。闻余有此，欲传其副，遂复从余分写本仍分写予之，并讎校之。”^①然张金吾所得之抄本，今未见明确著录。

是书抄本传世较多，其中一些与宋刻原本行款相同且过录黄丕烈等人题跋，当是辗转传录自黄丕烈抄本。比如张蓉镜于道光三年从张金吾处抄录是书，张金吾书跋于张蓉镜家抄本云：“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吴县黄氏士礼居旧藏，转入汪氏艺芸书舍，金吾从之影写一分，芙川此本又从金吾藏本传录者。”^②又有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五年（1825）袁氏贞节堂抄本（索书号：善本 04271），书末跋云：“道光五年春三月，仿士礼居黄氏影宋本抄录，藏于五砚楼贞节堂。袁识。”五砚楼、贞节堂为袁廷桢室名，他与黄丕烈同好藏书，又为姻亲。袁廷桢于嘉庆十四年（1809）病故，此本当是其后人所抄。张蓉镜、袁氏贞节堂抄本皆于黄丕烈抄录后不久再次传抄。

从上面与书籍抄录有关的资料中，笔者发现作为稀见文献，这些黄丕烈旧藏书籍在当时或稍后曾经被多次传录。除去无抄本流传的《医学启源》，本文所论及的 11 部书，均有直接或间接从黄丕烈处传录的其他抄本。其中，《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麟台故事》有陈揆、张蓉镜传录本，《北山小集》有张蓉镜、袁氏贞节堂传录本等。以数量计，黄丕烈自己曾录副 3 部，张蓉镜传录 5 部，陈揆传录 3 部，袁氏贞节堂传录 1 部，此外还有与黄丕烈原藏本有渊源关系但抄写时间尚不明确的清抄本若干部。

作为吴中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与众多书友往还，文中所述诸书抄录源头出自黄丕烈自不必言。但一书分抄数本的现象，一方面以事实呈现了黄丕烈书籍为其他藏书家所关注、曾抄录多份副本；一方面也对版本研究和藏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抄录所据底本如何、哪些抄本具有同源关系？虽然逐个辨别抄本来源、挖掘潜在的线索并非易事，但一定程度上的追踪溯源应可得到更多的发现。

①《尧圃藏书题识》所载黄丕烈跋，误“爱素好古，收弄秘册”作“爱书好古，收弄秘册”，误“爱日精庐读书志”作“爱日精庐藏书志”（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八，第 185 页）。

②国家图书馆著录此本为清道光七年张蓉镜家抄本，但抄录时间当为张金吾跋所题署之道光三年。

四、关于藏书家之借抄

叶德辉《书林清话》“明以来之抄本”一节列举自明代吴宽、文征明,至毛晋、钱谦益,再至清代朱彝尊、吴騫等为藏书家所宝之抄本二十馀家,并谓诸人“皆竭一生之力,交换互借,手校眉批”^①。论者多据此谓抄写图书是补充藏书的重要手段,且明清藏书家有互抄互借之风^②。私人藏书家之间因书籍相互往来,并借书抄录以互通有无,的确是明清以来藏书史上的重要现象。通过追踪张金吾从黄丕烈处抄录的书籍,笔者部分地还原了张金吾假借抄录的情形。而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也可尝试对当时藏书家之间的假借抄录即“借抄”的特点进行描述。

从目的来说,抄录书籍无疑是增益收藏的重要方式,而在实际的应用中,抄录往往得到非常灵活地利用,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起到完善藏书的作用。首先,藏书家凭借其学识、眼力选定流传稀罕而具有价值的书籍进行整部的抄写,即如孙从添《藏书纪要》所言:“况书籍中之秘本,为当世所罕见者,非抄录则不可得。”^③其次,藏书家们往往通过抄录对已有的藏书进行缺则补之、异则校之的工作。上文对张金吾抄录书籍情况的描述中,就有不少抄补或校对的事例。顾广圻、周星诒有“虞山派”“常熟派”藏书家之说^④,谓常熟一带众多藏书家有嗜抄录、重版本、喜校勘的特点。应该说,抄补、抄校是很多读书好古的藏书家日常的功课。以“抄”这一行为为核心,藏书家通过抄录整部书籍丰富收藏,遇足本、校本、异本,则进行补、校。抄藏、抄补、抄校,构成了以收藏为主,兼具版本、校勘作用的读书者之藏书。

从质量来说,在传抄本较购藏本多出的抄写环节,藏书家力求精善。不仅多用善书者精抄,而且加以文字校对,将校勘中对文献内容的严谨的态度迁移到抄录过程中。叶德辉例举明以来为藏书家所宝之抄本,就多有书法精楷、校对精严的评价。而黄丕烈在为张金吾录副《北山小集》时,就专门说明曾为抄本作文字校对:“遂复从余分写本仍分写予之,并雠校之。古云书经三写,鲁鱼亥豕。自谓此写本出余士礼居,虽未经老人过眼,然儿孙辈颇

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广陵书社,2007年,第191页。

②曹之:《古籍抄本概述》,《图书馆界》1988年第2期,第43-46页。曹之:《清代抄书考》,《图书馆》1990年第1期,第36-40页。

③孙从添:《藏书纪要》第三则“抄录”,清嘉庆六年黄氏士礼居刻本,第6-7叶。

④谢灼华:《试论清代江南常熟派藏书家》,《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1期,第43-46页。

习闻校书绪论,一一手校,当不致为抄者所误。”^①揣其语意,出自士礼居之抄本应多经校雠,不致有抄录之误。这样的精抄本文字可信,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抄录底本的文献价值。而俗手传抄往往“乌焉帝虎从此日多”,甚至被藏家斥为“以伪乱真”^②。

从范围来说,多数藏书家仍然持有“鬻及借人为不孝”的观念,将书籍藏而宝之,并无广泛流布之意。朱彝尊偷抄史馆之书被贬官之“美贬”、设计连夜赶抄钱曾藏书之“雅赚”,足以说明借抄并非易事。据统计,“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藏书家共计 739 位,不吝借书的藏书家仅有 13 位,约占 2%;而《中国藏书家通典》收录的中国古代藏书家共计 2445 人中,乐于借书的藏书家也只有 24 人,所占比例还不到 1%”^③。况且借书与人,确有不肯归还或遭遇水火之虞。比如鲍廷博曾藏钱谷手抄《游志续编》,然而“吴君枚庵借录未还,出游踰十稔不归”^④,颇为无奈。出于对借书安全的考虑,藏书家之间的借阅大多是在熟识好友的范围内。即如黄丕烈之交游广泛,但其题跋中屡见的共赏、互借之事,也多限于与之同气相求、相得无碍的几位书友之间。

从形式来说,清初曹溶《流通古书约》曾对借抄提出一法:“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抄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湖燕北皆可行也。”^⑤“好书不出户庭”,而由藏书主人操持缮写,对珍籍来说是极大的安全保障。张金吾从黄丕烈处抄录的书籍中,《碧云集》《李群玉集》《北山小集》三部,黄丕烈在题跋中明确提到是雇胥为金吾录副的;另《班马字类》一书,现存有黄氏应陈揆委托为其录副之信札;而张金吾本人也曾“用倩善书者录副”《说文解字补义》一书,赠予何元锡^⑥。作为借出实体书籍的变通方

①程俱:《北山小集》,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七年张蓉镜家抄本,书末过录黄丕烈跋。

②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一“《诗说》十二卷”条,第 15 页;卷八“《魏鹤山集》一百二十卷”条,第 192 页。

③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26 页。

④陶宗仪:《游志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清劳权抄本(索书号:善本 17219),书末过录鲍廷博跋。

⑤曹溶:《流通古书约》,清鲍氏知不足斋刻《知不足斋丛书》本《澹生堂藏书约》末附,第 2 叶。

⑥张金吾撰,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第 97-98 页。

式,“好书不出户庭”可以避免失书之虞,同时很可能在客观上促使抄录行为更加活跃。

以上与抄录相关的诸种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反映了抄录者对于书籍传播的观念。同样是抄书,保守派私人藏书家为藏而藏,开放派则意在流通、使用^①。张金吾从黄丕烈处的抄录,反映出二人共同具有的较多数藏书家更为开明的文献流通观念。黄丕烈好古嗜书,与众多藏书家互通有无,亦有通过抄录罕见之书使之流传稍广之意。他在《铜壶漏箭制度》《准斋心制几漏图式》跋云:“原书旧抄当是影宋,余恐流传未广,录副以便传观,或互相抄录俾晦者益彰,岂不快哉!”^②张金吾不以珍籍自秘的观点表达得更为鲜明。张金吾得元刊《说文解字补义》后,录副赠予何元锡,并云:“兹既幸归予手,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且予喜藏书,不能令子孙亦喜藏书。聚散无常,世守难必。即使能守,或童仆狼藉,或水火告灾,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则予且为包氏之罪人。用倩善书者录副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③张金吾从黄丕烈处抄得的《北山小集》,又允张蓉镜再作传录,金吾跋云:“尝见藏书家得一宋元旧籍,辄思秘之帐中。噫,此何说也!古之人读书稽古,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书,而历七八百年,几经兵火,旧槧如新,抑又难矣!爱古者碎金片石、断砖剩尾犹且公之同好,互相激赏,况书籍为作者精神所寄,灵爽所凭者与?得之者其亦思故人成书之难何如,流传之难何如,今既幸为已有,冥冥中郑重付托,大望后之人广为传布者又何如。乃谬为爱护,秘不示人,甚无谓也。”^④

对书籍的宝爱,若是局限于物本身,则会采取缄秘以使书贵的做法;若是将书籍作为作者精神所寄、灵爽所凭的载体,则更望其广泛流传,从而在传递文献内容的同时更在延续文化的层面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意义。

谈到明清藏书风气时,藏书家之间互抄互借、互通有无的现象常常被提及。但这种说法通常是一种直观的印象,借抄的具体情形如何、抄本的来源和去向如何,却需要更多的事例来做分析。得益于《爱日精庐藏书志》和黄

①程焕文:《藏而致用 流通开放——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的本质和主流》,《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第4期,第66-73页。

②孙逢古:《铜壶漏箭制度》《准斋心制几漏图式》,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三年黄氏士礼居抄本,书末黄丕烈跋。

③张金吾撰、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第97-98页。

④程俱:《北山小集》,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七年张蓉镜家抄本,书末张金吾跋。

丕烈题跋对书籍来源和去向的记载,辅以对张金吾传抄黄丕烈 12 部书籍的现存状况的调查,笔者得以按图索骥,部分地还原张金吾假借抄录黄丕烈藏书的情形。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得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藏书家们如何在较为安全的范围内,通过代为抄录的灵活方式,高质量地进行藏书的补充和完善。而其中观念较为开放的藏书家之间的抄录,在客观上使得秘者得宣、晦者得彰,积极地推动了古籍文献的保存和流传。

虽然个案研究仅能管中窥豹,但黄丕烈、张金吾均为藏书史上比较重要且活跃的藏书家,以他们之间的书籍抄录为切入点,并旁涉因书籍产生关联的其他若干藏书家之抄录,当能以点带面地反映出当时藏书风气的一些特点。分析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书分抄数本的现象,对藏书史研究来说,是对抄录中书籍流动的细节呈现;对古籍工作者来说,则对辨别清抄本来源提供思路的同时,也留下了更多需要溯源的工作。

【作者简介】李文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藏书史。